

校史钩沉

习仲勋书记1949年9月21日 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编者按:习仲勋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曾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区政委、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在此期间,他非常重视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尤其是有着革命熔炉之称的延安大学和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教育教学工作。1949年,适逢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开学之际,习仲勋书记亲自前来并发表重要讲话,现全文刊登如下:

同志们!
正当人民政协开幕,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北大进军,全国解放快要胜利之际,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在今天举行开学典礼,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我代表西北局向同志们祝贺。

西北在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已接近全部解放了,自扶郿大捷以后,敌人分北、中、南三路溃退,我军也分三路追击,现在南路已将胡匪关于秦岭以南,逼得胡匪只能防守;中路接连解放了兰州、西宁、武汉,直至新疆,要打开国际通道;北路我十九兵团迅速追击,已攻入宁夏省境,解放了中宁等地;宁夏指日可下。华北蒋匪最后据点绥远,也于本月十九日和平解放。这对西北的全部解放,是有很大意义的。西北战争很快即可结束,以后虽有战斗,也决不会再有解放兰州以前那样大规模的战斗了。但我们也不会用战争解决问题,以后宁夏新疆的解放,也许采用政治方式解决的。(按:迄至整理记录时止,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于二十三日黄昏进入银川,基本上解放了宁夏,二十四、五日新疆因陶峙岳等率部起义,亦已获得和平解放)

从此以后,我们担负的任务已不是战争,而是和平建设,这个任务比战争的任务要艰难百倍。军事的胜利仅仅是推翻了敌人的上层建筑。现在经济建设任务,农民彻底解放的反封建任务,还未大规模的着手进行,这些任务都是担负在我们肩上的。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担任起了培养干部的任务,这是我们一个强大的政治兵团,要我们率领广大群众去和我们的残余敌人与封建势力搏斗。

在我们学校里,有大量的知识分子,有一部分国民党军官和公务人员,但无论来自哪一方面,既已入学,就要改造思想,建立新的、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为人民服务。

过去有好多人对职业问题发愁,今后参加革命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职业,职业问题是能得到解决的。但职业是不应该放在第一位的。要和人民在一起,竭毕生之力,贡献给人民。为谁服务?这是一个基本问题。这问题弄明白,则职业问题迎刃而解。若这一点作不到,你就是学了许多马列主义和知识,仍旧是一点用处都没有,老百姓是不需要你的。失

业,失学与否的问题,决定不在我们,而是看老百姓需不需你。从前国民党以反人民为能,反之我们则以为人民服务为能。现在不见得人人都有饭吃,西安失业失学问题仍然存在,我们都要解决,若有一个没人吃饭、失业、失学,那都是我们的责任。政权在我们的手里,我们要负起一切的责任。

没有思想改造,任何技术都不能掌握,不能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必需走的一步,这一步应该老老实实的走过去,给以后学习其他本领和技术打下一个基础。这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它,一切技术都是空的。

同志们!我们的要求是要你们毕业后到工厂去,到农村中去,到兵营里去,到经济部门的各种企业中去。在实践中去锻炼一二年后,才可以算为一个比较完全的知识分子。

在学习的过程中,旧社会里所习染的坏东西要完全取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新的东西。在取出旧的东西时不要怕,揭发旧的东西虽痛苦,但能根本解决问题,旧的不从头脑中取出,新的是不易装进去的。我们的旧思想,旧东西并不是个人的罪过,而是旧社会的罪过。扫除思想上的垃圾,这是民大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的任务。

过去有人隐瞒自己思想和历史的,我们帮助他们觉悟过来,卸下自己的包袱。谁不觉悟就是拉自己的痛苦过程,有意识的走弯路。我们学校一定要保持民主作风,对于一些落后分子,从前失过职的,曾经作过不利于人民的事的人……,要耐心说服、教育、提高。必须使他们学习过后,有了觉悟,来一个思想上的自觉自愿。决不要硬追、硬逼,形式凶,实际上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在这个精神底下,原则底下工作,我想同志们的进步一定很快,一定能从这个政治兵团里练出来成一个老兵。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有一种艰苦朴素的作风,这是应该的。需要提倡的。我们要老老实实的锻炼自己。新社会的任务大得很,建设新中国若没有成千上万的艰苦朴素的干部,成功是不可能的。毛主席说:“今天的全国伟大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说明以后的步数还多得很,以后建设的任务也更为艰巨。



习仲勋书记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 (油画 源于党史馆)

也许同志们有这种看法:老干部作过很多革命工作了,摆老资格,自满。果真这样,那便是背包袱,有被淘汰的危险。另外新干部对自己也不要轻视,后来者居上,前一辈的人,终究是要死亡的,许多工作是需后来的人来担负,我们还有很多的没作。

目前,西北正在闹干部荒,处处都在喊要人,但是不经过改造,基本思想没有经过改造,立场不明确,那是不能工作的。要从思想上改造,要从政治上武装,这是一个政治工厂,要训练出大批的政治干部。一批知识分子要在里边修理一下,擦一擦锈,补充一下,配一配螺丝钉。西北的理想社会要我们努力去改造,去建设。

(原文刊登于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主办的《民大生活》1949年10月9日第三期)

各位同学!各位工作同志: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学员今天毕业了,由于全体学员的努力,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完成了我们原定的教育计划,获得了很好的成绩。使几千个青年经过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结合实际,自我改造,解脱了各种旧思想影响的束缚,走向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这是一件大事。随着中国人民在军事上,政治上的胜利,已经开展了和正在开展着一个中国人民思想大解放的运动,这就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广泛传播。就是各地普遍掀起的群众性热潮。就这个学习运动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首先和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扫除旧影响,建立新思想,在我们实际生活中,蒋介石匪帮反动的思想体系,和各种狂妄的欺骗宣传,虽然早已破产了,幻灭了,但其残余影响还是存在的;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东西,还很多很多;旧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中起消极作用的东西也还不少,这些统统叫做“旧影响”。凡在旧社会制度下生活过的人,都不能不保有和沾染这些社会的思想影响,只是有多少、深浅、浓淡的区别,而不是有或没有的区别。而且一般的说来,由于这些旧的思想,是在很长时间的时期内,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缘故,它给予人们的影响,不但是非常普遍的还是非常牢固的。马克思有句名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巧是相反,这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是不可动摇的真理。所以问题是对这些旧影响采取什么态度?是留恋、保存呢?还是努力扫除呢?今天,我们已经生活在新的社会制度下,我们正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的阶级关系、政治制度,以及反映这种新的政治经济的思想、理论、工作作风等等,都是与国民党统治时代截然不同的,正相反对的。在今天,要留恋、保存那些旧影响,会有什么作用?那就是阻碍社会的发展和前进。斯大林同志说过:“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和理论。有旧的和新的,它们是已经衰亡,并为社会上那些衰亡着的势力利益服务的东西。它们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前进”(见党史第四卷)。对于每个人来说,不能解脱各种旧影响的束缚,就不能适应新环境,不能在新的社会生活中充实和发展自己,成为个人进步的绊脚石。所以一定要努力扫除旧影响。要当整个社会的和个人的一件重大事情去做,要有真正的决心,真正的勇气,还要正确的方法。怎样扫除呢?要学习先进的思想和理论。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说:“有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社会上先进势力利益服务的东西。它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前进。”(同上第四章)。现在最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就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是共产主义的思想、观点和理论。这个理论,已经表现出无比强大的力量,光芒万丈,照耀着全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胜利斗争的道路,全国各民主阶级,各党派,各民族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已共同承认了它的领导地位,它已经是全国人民实际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了。只有好好学习这个先进理论,应用这个理论去结合实际生活,说明实际生活,批判旧的东西,认识新的东西,才能有效的进行自我改造,把一切旧影响都扫除干净,建立起新的革命人生观,并在参加实际斗争中逐步地把它稳固起来。你们已经是这样做了,还要继续这样做。在西北的学习运动中,你们是走在前头,应当把经验总结起来,写成文章介绍各地,有利于推动各地的学习运动。

民大第一期的全体同学们,已经在学习中,经过思想改造,初步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要走上各种实际工作岗位。我代表人民政府表示热烈欢迎。参加实际工作,为祖国,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是大家的共同愿望,也是对大家的一种新的考验。我们做革命工作,是非常注重实际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工作人员的服务好坏以工作的实际效果为标准,向大家讲清楚,今天我们实际工作中是有很多的困难的,特别是新干部,刚走到实际工作中去。情况不熟悉,群众不熟悉,工作不熟悉,周围共事的人也不熟悉,这就必然要碰到许多困难。我们对于这些困难采取什么态度呢?是被困难将自己吓退,灰心丧气呢?还是勇往直前去战胜困难呢?这就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考验。我们一定要战胜困难。只要我们在和在一块工作的同志很好的团结,特别是向老干部学习,紧密联系群众,刻苦用功,不断改正缺点,求得进步,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而且只有在不断克服困难中,才能真正坚定自己的革命思想,把自己锻炼的坚强起来,所以为人民服务的,不仅是一般的口号,而是要表现在每个人的具体活动中。这就需要大家一直实行下面几条:

(一)坚决拥护和执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种政策、法令。

(二)建立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产的革命思想,和廉洁,朴素,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三)努力工作和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专业技能,不断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这是一般的要求,对于共产党员,还要要求他们在各种工作中特别的克己奉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成为群众的模范;遵守党纲,党章,服从党的决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体,人民的主体,是创造社会财富建设国家的主力军。讲为人民服务,主要就是为他们服务。只有他们的生产事业发展了,他们的物质生活确实得到改善,文化知识真正提高了,一句话,只有真正把他们的事情办好了,其他各阶层的事情,才有好的起来的可能,整个国家的事情才有办好起来的可能。这是我们时刻都要牢记的。

希望大家勇敢地走到实际工作中去,把学校里学到的东西,在实际中再锻炼,再提高。每个人都争取成为建设新中国事业中的突击手,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模范工作人员。祝大家努力。

(原文刊登于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主办的《民大生活》1950年4月10日毕业纪念专刊)

习仲勋书记1950年4月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两校的回顾 复校的艰辛

赵建学

65年前我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陕西省委及省人民政府工作,1956年8月又考入西北俄专、西北大学法律系、西安政法学院学习。当时的西北大学和陕西省上主要领导都直接领导过延安、民大和西北政法干校的工作。1957年我从西北俄专转入西北大学法律系学习,58年西大法律系全建制并入中央政法干校西北分校组建西安政法学院,我作为法律系的老三届学生转入我校学习。1960年7月毕业留校先从事党史教学,1963年又改做敌情基础和公安业务教学。由于这样的背景我对民大及西大两种类型的大学都有所了解,很有感情。因而我认为这两类大学都有悠久的历史,各有长处,都应进行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取长补短,以便继承各自的长处、长处发扬光大。由于“文革”的发生,1969年招收最后一届学生后,1972年我停办了,学生结业了,教工都散了,校址转交部队使用,仅留下十几位同志的留守处,一停就是六、七年。1978年批准复校,我即从大荔县下放返校,也亲历了复校的艰辛,这段历史亦应回顾。

一、两校的回顾

延安、民大及西大的两校历史我都有缘短暂的直接、间接的联系,现作如下回顾。1949年2月,16岁时我从宜君老家徒步400华里到达革命圣地延安。首先投奔延安,拜会延安校长李敷仁先生,想进延安大学,未能如愿,就到西北局从事党的机要工作,1949年4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2月即光荣地加入共产党。

(一)延安改建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5月20日西安解放,西北局机关立即迁往西安,主管延安的西北局,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将延安大学更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将其迁入西安,并任命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府主席马明方为校长,李敷仁为副校长。6月30日,就以民大的名义招生,到了7、8月份共招收学生2216名,以后又录取了部分新生,共计2923名,以文化程度分别编班,短期轮训。8月10日,马校长第一次在全校干部大会上讲话,为民办办学指明方向,指出:“我们学校是一个短期的,以政治训练为主的干部学校。”到了第二年4月6日,有2444名学员毕业,在永乐店三部校园内举行了一、二、三部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西北局习仲勋书记作了重要讲话,马明方校长还为本期学员结业纪念册题词:“预祝同志们在各个革命工作岗位上,将学到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知识,很好地和当前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密切联系群众,发挥创造性为建设人民的新西北而奋斗。”这期学员毕业后分配到西北五省工作。就在本期学员毕业分配不久,西北局决定:民大原由西北局直接领导,改为西北军政委员会领导,由于马明方校长工作繁忙,免去了他的校长职务,任命原副校长李敷仁为校长。1951年1月,李校长参加赴朝鲜慰问团离朝,又任命刘端棠为副校长(1908—1997年,1953年复调任西北大学副校长,校长等职)主持校内工作。1990年刘校长写的回忆录指出:民大又举办了多期行政、司法或其他专业的培训班。民大前后四年中共培养了11000名干部,他们不怕艰苦,不计名利,一批又一批地竞相投身于祖国大西北建设事业,献出了青春年华,他们早已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今天,不少同志还在继续为大西北的四化

建设大业勤奋工作。他们总是说:“民大的学习,是我一生的转折点……”

(二)“民大”改建为“西北政法干部学校”。1953年夏,我们经过了国民经济恢复、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抗美援朝”,要开始政权建设以及恢复,组织新的司法、检察、民政等方面工作急需大量司法干部,因而上级决定将民大改建为西北政法干校,以培养县级以上司法、民政、检察干部。民大结束后,上级决定将原民大四部主任刘若曾,原民大三部主任张治平调任干校正副校长。他们奉命带领民大部分干部到南郊八里村筹建西北政法干校,短期培训政法干部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大体过了一年多后大区撤销,就将西北政法干校更名为中央政法干校西北分校,不仅为西北五省培养政法干部,还包含了为山西、河南、四川等省培训政法干部,此时归属中央政法干校领导。这段时间的档案已于60年代初上交陕西省档案馆,此段时间的老同志也很少回忆录,资料鲜见,亟待收集整理。

(三)西大法律系是怎样组织建设起来的?西安解放不久,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接收陕西西北政法专科学校的学生并吸收一部分知识分子共约160余人组成的司法班,由高等法院院长马锡五、朱要担任正副主任。后来也编入民大五部序列,但一直由高院及西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副部长朱要领导,马老、朱老一直亲自为学员授课。民大五部司法班于1950年11月结业后,接着在司法部领导下,着手筹办西北军政委员会司法班,又先后办了两期,训练学员数百人分配原单位工作,这个司法班轮训近三年之久。于1952年在西北大学开办了司法专科学校,学制二年。面向全国招收了90名新生入学,1954年毕业分配工作。司法专科学校办了一期结束后,紧接着8月开办筹办西大法律系,当年9月招收了第一届新生50余人。由西大党委书记朱要担任系主任,姚凤栖担任助理系主任,以后从1955年—1957年又招收了三届学生大约有300人。1957年后,从北京政法学院党委书记调任系主任兼系总支书记。

(四)西大法律系全建制并入中央政法干校西北分校组建西安政法学院。首任院长为刘若曾并兼任党委书记,副院长为张治平、吴仲璧,党委副书记为王润。法律系主任为郭怀都,党史系主任为曹树铮,哲学系主任为闫希贤。副主任为王陆原等。西大法律系是1958年10月并入中央政法干校西北分校的重新组建西北第一座正规的法学高等学府——西安政法学院(1963年改为西北政法学院,2006年更名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系所有领导、教职员以及未毕业的300余名学生全部并入,以及有百年校史的西北大学及抗日战争迁入西安的东北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组建西北联大,他们大量的图书资料都入西安,在全国独有的一些珍贵的有关法学图书资料一并无偿移交给政法学院,为我校以后组建学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1959年8月份开始我校才正式以政法学院招收本科生。这样政法学院从延安、民大到政法干校一直以短期训练干部转入正规本科制的学历教育。

在建院初期,这个学院的条件很差,没有教学楼,没有图书馆,没有办公楼,没有教职的宿舍楼,我们这期学生都参加了大炼钢铁,修建办公大楼,参加打地基,我们都同级同学王德增,因打地基而砸伤了

脚,从而打上石膏卧床休养。经过几年的努力,继承延安、民大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新建了教学楼、办公楼、图书馆、职工宿舍楼并招聘了大批教职工,还组建了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新闻等多学科的学院,逐步走上了正规的多学科的高等政法学院。1960年7月我们年级部分同学提前一年毕业留校搞教学工作,我先搞党史教学。1963年中央批准政法学院改为西北政法学院,专办法律专业的政法学院。这时我又被调到刑法教研室,从事敌情基础和公安业务教学。为了备公安业务课,1964年元月派我到中央政法干校进修,适逢毛主席、刘主席等中央领导接见了我们第八期学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照相。《人民日报》发了消息。由于“文革”开始,仅在1969年招收了最后一期学生,1972年(停)办了,在校的学生全部结业分配工作,校址交给部队使用,职工都分散各地,已经建院十年的西北唯一政法高等学府,就此结束。

二、复校的艰辛与时老对复校的贡献

1976年,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粉碎“四人帮”以后,又在“三中全会”的指引下,经过揭发批判,拨乱反正,使全国各项工作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我们学校1978年奉命恢复。我从大荔调回学校继续从事公安业务劳改教学、中国监狱史、犯罪学等教学工作。当时困难重重,一无校址,地方被部队占用;二无教职工,原有人员下放自白,后被分配省内外地及部队院校、企业、农村,要收回亦很困难;三无教材图书资料,有些原有图书资料远拨新建的延安;四、后勤物资也无保障,收回的校址已乱成七八槽。要恢复重建云,确为实事。在上级安排下,调回老院长王润,升为副院长郭怀都等领导努力承建。但由于事情非常复杂,涉及面广,好些问题难于处理,正在这时,陕西省(人民政府)原秘书长、副省长时逸之(1907年—1982年7月29日)1978年平反任省委、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不久即患脑中风,病愈不久,边住院边工作,既要忙于人大的相关工作,还忙于“加强政法队伍建设,保卫四化顺利进行”,给《陕西日报》约写专稿,亲自抓紧政法学院复校问题,还兼任陕西律师协会名誉主席,并于1982年元月11日亲自出席理事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曾为西北政法学院的恢复而多次奔走,为动员原政法学院教师归队,他曾两次以省政法办名义召集同志们开会,动员教师返校。一次在文八宾馆宾馆,一次在人民大厦,为了写聘书,还专门将起草好的底稿,拿到我院院长住处征求意见。由于我在50年代初,任时老的秘书,那天他还将我叫到王老的住处,当着王老和郭怀都的面,让我做他的联络员,协助解决复校的难题。由于时老的亲切关怀,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初步具备了招收的条件,1979年就开始招收新生。1979年10月13日终于正式开学,时老那时已身患食道癌重病,在西安医学院边住院治病,还抽空关注省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并亲临我院作讲话。当时我到中央政法干校学习“两法”,未能听取他的讲话。由于他的山西口音太重,大会记录同志听不懂,当我返校后,我根据录音进行整理,打印稿文稿还在我处保存,现特提供编写校史参考。

复校后在司法部以及陕西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几代院校领导领导下,在全校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壮大,现有南北两个校区,布局合理,环境优雅。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有专职教师745人,其中教授103人,副教授309人,具有和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教师119名。涌现出一大批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学科特色鲜明,专业涵盖社会学、人文科学、商学、工学四大学科门类。学校面向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招生,在校本科生近1.5万人,研究生2400人。经过70多年的发展建设,学校已成为全国法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之一,西北、陕西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和研究的重要基地。